

当代中国的 基督教神学方法

*A Study of Theological Methodology
in Contemporary China*

陈 驯 著

当代中国的 基督教神学方法

*A Study of Theological Methodology
in Contemporary China*

陈 驹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中国的基督教神学方法/陈驯著. --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11
(2011.3重印)

ISBN 978-7-80254-337-9

I. ①当… II. ①陈… III. ①基督教-神学-研究-中国-现代 IV. ①B9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28729 号

当代中国的基督教神学方法

陈 驯 著

出版发行: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100009)

电 话: 64095215(发行部) 64095213(编辑部)

责任编辑: 朱宇杰

版式设计: 陶 静

印 刷: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

版本记录: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10 印张 250 千字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54-337-9

定 价: 28.00 元

前 言

本书的题目为“当代中国的基督教神学方法”，意在理解当代中国在全球化影响下的基督教处境神学出路，特别尝试寻求用一些神学的方法去建构中国基督教神学。本书原文为英文，题为 *Globalization and Contextualization: A Study of Theological Methodology in Contemporary China*，写于2004到2006年。2008年9月开始用中文边翻译边重写。

本书尝试问一个基本的问题，也是我自己经常思索的问题：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应该如何做一个处境化的基督教神学？全世界的神学家非常多，神学的模式也数不胜数，我们应该借鉴什么？急于做成神学或提出一个能够吸引人眼球的神学观点并不困难，真正困难的是神学方法论。做神学容易，方法难。做神学不讨论方法是少有益处，有一个好的方法是神学的好的开始。先是“学如何学（learn how to learn）”然后才能“学如何做（learn how to do），”这意味着神学方法论的一个变化过程。一个有效的神学方法可以使基督教神学的工作事半功倍。当代中国，基督宗教的研究和基督教神学的研究正在越来越多地被不同学者群体所关注。在“做什么神学”与“如何做神学”之间存在许多急于要做的工作和要讨论的问题。坦诚地说，神学方法论的讨论在当代中国严重缺席。

中国的基督教神学研究学者大多是各干各的,每一个研究群体或个人使用各自的资源和方法去获得各自的学术目的。实践性多于理论性。神学方法论的真空导致神学学术现象“异彩纷呈”。因此神学的方法论讨论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积极的。就个人而言,孤立于自己的文化处境做神学就好比一个中国人在中国人群中天天用外语交流一样别扭。我们需要用中国的方法做中国的神学,这就是基督教神学在中国处境化的意义。当代中国不是一个以基督教文化主体意识的社会,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比其他所有宗教要年轻得多。然而,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却比其他宗教要快得多,而且基督教的研究也越来越火。不仅是个人兴趣,而且是群体或机构化的基督教研究大量出现在大学、国家和地区研究所、学院、教会、神学院中。在这样的氛围中,一些合适的神学方法论能提供基本的神学发展框架以及有益于宗教和文化在学术上的对话合作。

本书的研究方法不可能是单一的,因为全球化和处境化本身需要多元的分析方法才能解释得当。因此,一方面,本书将采用实践性的社会学分析去处理全球化和处境化的理论,总体上理解它们作为一个社会现象学领域中的人类历史发展进程。这个方法适合于分析当前中国的宗教特别是基督教神学现况。另一方面,有必要使用系统的分析去具体化神学方法论的探讨。从基督教神学发展历史的角度说,这个系统分析方法用于研究神学在当代中国的处境。中国神学家需要努力寻求一条可能的途径去建设和发展自己的神学,不仅是为了教会自己的发展趋向,也是为了寻求一个更加进步的、和谐的中国当代社会和文化秩序。

全球化提供中国新的发展机遇,中国的发展则回报给国际社会一些新的奇迹和积极动力。在全球化作为历史进程的大框架下,我们有理由相信 21 世纪对中国来说将不会是一个黑暗的世

纪。然而,人们同时也看到,在当代中国做基督教神学要比办公公司和做生意要难得多。当代中国正在经历全球化进程的各种变化,特殊性和普遍性交织共存。中国的当代处境总体上是全球化与处境化共存、机遇与挑战同在。基督教神学不仅是全球的,也是处境的。两千年的基督教思想的历史遗产具有全球性和处境性、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通过全球化与处境化的紧密互动,基督教文化会定居于中国的文化土壤。这是本书对当代中国处境的基本定位。

中国的当代性的定位应该放置于整个历史发展进程的框架中。全球化已经而且现在正在有力地、深刻地影响着中国,而中国也正在日益进步中影响世界新的格局。因此,所有对中国当代宗教特别是对基督教的分析都应该纳入全球化与处境化的互动关系中。基于当代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复杂性以及全球化本身的可变性和不确定性,盲目乐观主义的视野去审视当代中国的基督教神学可能是不现实的,但过于悲观显然不合历史发展的眼光。因此,理性主义的认识和现实主义的分析是可取的实践性探索方向。

没有绝对的和原始的关于全球化而且直接联系于当代中国的基督教神学发展现象的资料可被使用作为本书的底本来源资料。但是,一个可喜的现象是,只要有讨论全球化的书,中国一定是它们的主要课题内容之一;只要有讨论当代中国变化现象的书,中国的宗教特别是基督教的变化一定是其中的热门话题之一。因此,本书在资料的使用上是零散的,但这种零散又带给笔者更多的选择和取舍的空间。全球化与今天中国的关系越来越紧密、越来越复杂。大多数关于全球化方面的资料来自于社会文化理论,基督教神学在理论上涉及全球化的话题相对少得多。本书采用“全球本地化”(glocalization)概念作为一个基本的灵感去

解释全球化与处境化的关系;或者说,全球性与处境性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变化的互动关系。在对所有的零散的资料整理和使用过程中,本书将尽可能地保持资料的整体性、分析的连续性,以及紧密地围绕于本书写作的核心意图:基督教神学的方法论。

本书的基本结构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前言是本书的介绍,包括本书的写作意图、方法论应用、相关的课题研究和本书的结构和简单内容。

第一章尝试给出本书的核心名词:全球化与处境化。通过对它们的定义提炼出一个基本的理论主旨和研究方向。

第二章尝试回顾基督教在中国历史上的传播。在中国历史上基督教曾经在不同的朝代以不同的方式传入中国。这个历史的纵览旨在分析基督教在宣教过程中与中国文化相遭遇时所采用的不同的解决方法。基督教的宣教方法不仅取决于西方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特点和外交策略,而且与相应的中国历史时期的时政外交政策相对应。本章主要分析基督教的宣教方法,而不是判断基督教宣教历史的功过得失。

第三章尝试分析当代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以及宗教的发展变化。基于全球化作为当今世界发展变化的大背景,我们尝试分析一个大致的全球现象,即经济的发展与宗教成长的微妙关系。本章的重点将集中于基督教在当代中国的快速发展状况。从1979年改革开放至今,是本书所言的当代中国的历史区间定位。基督教在当代中国作为发展最快的宗教已经吸引了国际社会的注意力。基督教的发展不是全球化的单方面的影响而形成的,她的发展变化是全球化与处境化互动的结果。基督教的发展为神学研究和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基础。

第四章是紧接着前两章的关于宣教学方法论问题。它尝试分析当前中国处境中的基督教宗教和基督教神学研究。主要的

讨论内容集中在目前的基督教新教和中国大陆基督教研究(Mainland Chinese Studying Christianity: MCSC)现象。一方面,自从1980年基督教会重新合法开放以来,基督教神学的发展在基督教新教内也正在不断进步,而且经历许多的变化,尽管她的发展目前看起来依然相对缓慢。教义神学的讨论依然是教会神学最重要的任务。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神学思想建设(Reconstruction of Theological Thinking)作为一个新的神学运动已经越来越热,同时神学教育也正在面临巨大的挑战。

另一方面,基督教的研究热也在教会外部兴起。这个现象看起来比教会内部要发展得快而且复杂得多。中国大陆基督教研究(MCSC)是当代中国基督教学术研究现象。一些不同的个人和不同的组织热衷于从不同的角度对基督(宗)教进行研究。本章不仅分析基督教新教内部的发展情况,而且试图理解教外的基督教研究兴趣和热潮。通过分析这些现象,我们可以发现神学方法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第五章的内容将从理论的角度去比较地分析全球化和处境化。其目的在于理清全球化与处境化在概念上相关于社会学理论和基督教神学的融合。这个探讨是大胆而且有积极意义的。在当代中国,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和处境化的必然性对做基督教神学来说都是不可忽视的。全球化有利于中国在整体的综合国力上实现民族的复兴,而处境化有利于保持中国自己的文化个性和民族身份。对基督教神学家来说,强调处境化依然有着绝对的必要性。全球化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并不对立社会学和神学意义上的处境化。全球化与处境化不是一定要发生冲突的。全球化在当代中国有利于建立一个处境化的基督教神学。当代中国已经卷入全球化进程,世界的多极化将可能推动基督教神学的进一步处境化。

所以,全球化对中国基督教来说是历史性的机遇,发展一个适合于中国处境的神学对普世教会将有非常的积极意义。在本章中,我们不能不提到两个重要的学者:罗兰德·罗伯逊(Roland Robertson)和罗伯特·斯雷特(Robert Schreiter),他们都已经有了许多关于全球化与处境化互动关系的理论研究成果。特别是罗伯逊的“全球本地化”(glocalization)的社会学分析理论和斯雷特的“新的大公性”(a new catholicity)的说法会带给我们一些关于神学处境化的新思索。

第六章将尝试讨论基督教神学的一些方法。神学的本质决定神学的概念,不同的神学定义决定神学的方法。神学的方法不是一成不变的,神学的方法总是首先被有效的继承学习,然后才被更新、发展和进一步应用。所有兴趣于在当代中国做基督教神学的神学家都能从基督教神学历史的丰富遗产中学习基本的神学方法训练。本章尝试建议一些有益的方法,其中一些是神学家们通常使用的,也有一些是基于现代性或者后现代性的基督教神学考虑。

最后一章是本书的结语。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全球化和处境化的定义	(1)
第一节 什么是全球化?	(1)
第二节 什么是处境化?	(12)
第二章 基督教宣教方法的历史回顾	(17)
第一节 唐代中国的基督教“文化披戴”	(18)
第二节 明末清初基督宗教与儒家思想的“互补”	(25)
第三节 19 世纪基督教宣教中的“文化优越性”	(37)
第四节 20 世纪前期中国基督教的“自立运动”和 “本色化”	(44)
第五节 “三自爱国运动”和群众性神学尝试	(50)
第三章 巨变中的当代中国	(57)
第一节 经济发展与宗教成长	(58)
第二节 当代中国处境	(64)
第三节 基督教的发展和基督教文化热	(84)

第四章 当代中国的基督教研究和基督教神学发展	(104)
第一节 中国基督新教的神学发展	(107)
第二节 基督教学术研究热潮	(126)
第三节 处境的关注	(144)
第四节 神学方法论的缺席	(153)
第五章 全球化与处境化在神学理论中的发展	(160)
第一节 “全球本地化”	(162)
第二节 “新大公性”	(169)
第三节 基督教处境神学的困难	(177)
第四节 基督教处境神学的涵义	(192)
第六章 神学方法的探索	(212)
第一节 神学作为“道法”:基督教人文主义框架	(214)
第二节 神学作为“语法”:神学的解释学框架	(220)
第三节 神学作为“教法”:教会学的神学框架	(223)
第四节 神学作为“学术”:哲学神学的框架	(235)
第五节 神学作为“对话”:多极化框架	(243)
第六节 神学作为“科学”:认识论框架	(255)
第七节 神学的“普世性”意义	(271)
第七章 结 语	(278)
参考资料	(283)
致 谢	(304)

第一章 全球化和处境化的定义

第一节 什么是全球化？

1. 一个老的新现象

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理解,全球化作为一个历史进程的发展现象有它的历史背景。有些学者相信全球化应该被看成人类现象而且它的发生和发展有一定的历史了。也许它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后铜器时代的人类社会的文化间的贸易关系。^①而大多数人相信全球化的最原始动力应该归功于 15 世纪末到 16 世纪初的欧洲航海新发现。西班牙的航海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于 1492 到 1502 年间先后四次横渡大西洋,葡萄牙的航海家达·伽马则在 1498 年率领欧洲商船首次到达印度。新航路的开辟改变了欧洲乃至世界历史的进程。对欧洲来说,它有着告别中世纪的黑暗走向新崛起的标志性意义。因此这个时期被理解为全球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历史线索。虽然中国明代的郑和七次下西洋的航海壮举(1405 - 1433)要比哥伦布和达·伽马早 80 余年,它的贡献在航海和造船业以及中国海上贸易和外交上都是无与伦比的。但是客观地说,它在推动世界历史进程的意义上来说远不及前者。但在研究全球局部地区的格局变化时,郑和下西洋应该有其伟大的史学和积极的人类学意义。

① Schreiter 1997, 5. Lechner and Boli 2000, 2.

如今一个在大体上广为接受的观点是全球化时代始于 19 世纪末,20 世纪下半叶是它最具影响力的时期。二战后的世界格局重组是全球化的里程碑。更加具体地说,全球化(globalization)首次在英文中出现是 1959 年。^①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全球化在理论上似乎有它的可追根溯源的历史意义。全球化在历史发展变化中不是一个单一进程,而是一个“多极进程”^②,因为它的发展变化同时涵盖了文化的、经济的、政治的,以及宗教的进程。有学者相信全球化作为历史进程具有不同形式,出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比如说:古代(1600 年以前)、萌芽阶段(1600 - 1800)、近代发展(1800 - 1950)、后殖民时期(1950 - 1970s),以及当前状况(1970s -)。^③

然而,全球化已经存在一定的历史的观点并不总是被人信服。一些学者提出全球化是一个完全“新”的概念。这种“新”不是去否认全球化作为历史进程,而是去看待全球化作为一个新的人类发展现象,只是这个现象与人类的历史传统和古典世界的可见变化没有必然的联系。一些学者^④提出,全球化的概念仅仅在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流行,20 世纪 80 年代全球化才成为一个学术研究课题被不同行业的人们广泛关注。因此,全球化实际上是一个新兴概念,它正在发生在我们的身边,而且将继续发生下去。无论人们在意不在意、喜欢不喜欢,全球化作为一个发展现象将不会随着任何个人的意志而消失。因此全球化尚处于“初期的进程”(an incipient process),而且它可能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主导意识现象。全球化的好坏显然不是现在能下的结论,但是它的可变性和不确定性总是容易被人察觉。

① Schreiter 1997, 5.

② “A multidimensional process,” Robertson 2000, 53.

③ 例如, Hopkins 分全球化为不同阶段: archaic (before 1600), proto(1600 - 1800), modern (1800 - 1950), post - colonial (1950 - 1970s), and current (1970s - present). Hopkins 2002, 11 - 46.

④ 如 Osmer 2001, 37. Steger 2002, ix - x, 55.

因而全球化可以被比喻为一把“双刃的利剑”(A double-edge sword),^①它可以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新理念、价值、标记,甚至于可以付诸实践以及推广应用;同时它可能成为一种强有力的破坏者。“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可以理解为当前全球化的最好诠释。

全球化在当前已经被赋予一些不同的解释。首先,从经济的角度说,全球化被广泛地描述成一个全球经济发展的进程。在这个进程中,全球经济是互相依赖地形成整体(interdependently integrative)。换言之,经济全球化是指全球市场的一体化进程。伴随这个一体化进程,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人们从未停止争论一个非常有争议的问题:是否经济全球化真有它所谓的“不可避免性(inevitability)”和“不可逆转性(irreversibility)”。这个问题几乎决定了所有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谋略的决计和政策的制定。

其次,从文化的角度看,全球化在文化上的意义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直截了当地提出一个所谓的“文化全球化”概念显然为时尚早。一般地说,全球化在文化意义上的解读是暗示着全球文化的一种发展趋势,或者说是文化的现代性和文化实践价值在当代世界所发生的相似现象。因此,全球化在文化方面可以被理解为复杂的世界文化在当代经济全球化中的“互相关联性(interconnection)”和“互相依赖性(interdependence)”。人们普遍担心的是,这种所谓的“文化全球化”是否导致文化的“同质化”(homogeneity)或者导致更大程度上的世界文化“多元化(diversity)”和“异质化”(heterogeneity)。这种担心不是没有理由的。摆在大家面前的最大的问题是“文化全球化”的评测标准永远没像经济全球化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标准那样简单。文化是人类社会的精神性财

^① Steger 2002, ix. 前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Kofi A. Annan, 1996-2006 在职)先生也曾经提到,全球化具有极大的潜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它也有可能破坏甚至毁灭他们。我们的任务就是努力使全球化能为所有人提供进步、繁荣、安全。Kim, S. 2000, 1.

富,它显然比任何经济模式和做生意要复杂得多。用一个绝对的、单一的文化标准去衡量全球 60 亿人的生活习惯和风格习俗显然是不可能的。

再者,从政治的角度理解,所谓的“政治全球化”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与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相比,政治的全球化毫无疑问更加富有争议性。全球化作为一个政治进程仅仅显示一个渐进发展变化中的政治意识形态在局部地区的共同点。民主、自由、人权、平等这些政治理想几乎出现在所有国家的宪法和法律中,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人们把生存的美好希望寄托于可能发生的政治全球化,但这几乎是虚无缥缈的。因为所有人对政治的理解不尽相同,对政治理想主义和生存现实主义都存在实践上的困难。也有人把政治的全球化寄托于经济全球一体化和世界文化的可能大同性上,这听起来激动人心,但是仔细一想便觉得问题重重。最核心的问题是谁会真的相信一个全球的自由贸易市场就能够实现人类同一个政治理想。而什么是人类社会共同的政治理想和 60 亿人政治理想的判断标准呢?从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长河中,人们几乎无能找到相似的可参考性。

2. 全球化定义与基督教神学问题

我们已经简单地讨论了全球化是人类发展中的一个老的新现象,我们相信不同的人因为不同的处境以不同的方式根据不同的需要给予全球化不同的解释。谈论它的定义有利于我们理解它的本质。比如,全球化有时被定义为一个“社会进程 (a social process)”。^①这个进程具体地说就是人类在一个生存空间组织中社会关系的变更,所有跨地区互动关系以及区域间合作的社会事务具

^① Bauman 1998, 12. Held 1999, 16.

有一定的广度、深度、强度、速度。全球化有时也被人们定义为“全球亲近性 (global proximity)”和“全球相互关联性 (global interconnectedness)”。^① 另外一些学者则直接地定义全球化为“一个整体的世界 (the world as a whole)”或“一个地球村 (a global village)”或“一个去边界化的世界 (deterritorialization)”等。^② 还有一个在联合国常用的带有艺术性的词就是全球化意指着我们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的全球邻舍 (our global neighborhood)”。^③

此外,为了说明国际商业贸易的相互依赖性和多极化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人们在整体上也习惯性地称呼全球化为“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或“普世化”(universalization)。一方面基于日益频繁的商贸自由的扩大化,全球化有时被直接地认为是世界经贸自由化的代名词。它意味着一个开放的、跨国界的世界经济体。二战后,伴随着美国经济及其作为西方国家的超级大国代表,西方人很引以为荣地理解全球化为“西方化 (westernization)”、“现代化 (modernization)”,甚至直接指着“美国化 (Americanization)”。20 年前,人们一提到现代化,自然会联想到美国化。如果人们说 17 到 19 世纪欧洲是整个西方的代表,那么可以毫无夸张地说 20 世纪就是美国的世纪。这已经是过去的历史事实了。

在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人都自豪地标榜美国文化已经取代欧洲大陆成为西方文明的代表。全球化作为美国化在历史上乃至今天依然能被理解成一种全球经济和政治动力,它代表了西方的现代性、社会结构和人文价值在全球的兴起和扩张。在这个过程中,许多世界各地预先存在的文化和原本地区的自定义的社会结构被迫重组和改变。这就是人们经常说的“西化”。然而,21 世纪的头十年已经快要结束了,美国式的全球化似乎依然强盛,但是随着其他大国以及区

① Tomlinson 1991, 3 - 10.

② Robertson 1992, 16. Scholte 2000, 16.

③ 转见 Kim. S. 2000, 7.

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政治格局的时翻刻变,没有人能完美地预测“美国化”的将来。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能否风光依旧,那就看全球化的历史在 21 世纪人类怎样续写了。

以上讨论基于全球化发展的历史,主要以经济全球化为核心定位然后涉及政治和文化层面的解释。在宗教方面尤其是在基督教领域对全球化在理论和实践上直接的回应不多。这里本人愿意抛砖引玉地对全球化的定义从基督教神学的角度做一些简单的说明,以便为本书后来的论证做点铺垫。

首先,全球化不合适被定义在任何单一超级大国的框架内,诸如“美国化”的说法。没有人能否认在过去数十年的全球化发展历程中美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美国化”基本上表达了自二战后以美国为核心的世界政治格局的反映,以及以美国经济为龙头所带动的全球经济发展势头。美国化在概念上体现了美国强盛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世界影响力。在基督教神学发展历史中,当欧洲的基督教神学在 20 世纪后半期出现神学的冷清和不景气甚至于停滞不前的状态时,美国的基督教流派和神学思想却异常地蓬勃发展。基督教在过去 20 世纪后半叶的发展和神学的进步与美国在世界扮演领导的角色以及推广美国文化和意识形态不无关系。因此,基督教以及基督教神学或多或少地披上美国人文色彩和沾上了美国的政治理想。

然而,从基督教神学的角度来说,全球化在神学上的理解不应该等同于美国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上帝的福音不能与任何地上国度的人文价值相提并论。简而言之,我们不能把美国人文价值和意识形态当作基督教信仰或神学教条。即使在欧洲,也很少有人把美国文化价值和社会风气以及意识形态看成为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内容而付诸神学的解释。在全球化的进程中,“美国化”或“西方化”与基督教信仰和价值都有本质的差异。所以基督教神学不应该忽略因为所谓的美国化而使得基督教信仰正在失去其本质和基督教传统性的